

文学·文化·文明:外国文学研究与区域国别学研究的交叉融合发展

南京大学 王守仁

《多元文化视野下的大洋洲文学研究》是彭青龙教授担任首席专家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不仅结项被鉴定为优秀,而且入选了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八卷本的成果堪称皇皇巨著,在学术思想、理论观点、研究方法、研究内容上的创新可喜可贺,特别是对于多元文化主义理论所进行的系统研究,从多元文化视角对大洋洲文学所做的整体考察,对世界文明多样性与文明交流互鉴这一重要问题所进行的分析概括,以及提出的具有科学性和时代性的文明概念都具有重要价值和学术意义。

外国语研究与区域国别学研究是独立的学科,两者存在共同共通“相连”之处,可以跨学科交叉融合发展,一条重要路径是文学社会历史批评。在外国语研究与区域国别学研究之间建立起直接的通道。去年我在南京大学组织召开了文学的社会历史批评研讨会,上个月开了第二届,倡导文学社会历史批评。文学社会历史批评作为文学观,强化文学与生活的关联,引入社会与历史的维度,注意作品思想内容的现实关照,同时,也不把文学置于从属地位,将其简单看作历史的注脚,而是坚持文学本位,强调文学作为个体对生活的体验,具有主体能动性,因此,称之为文学社会历史批评,以区别于旧的社会历史批评。在彭青龙教授主持的这个项目中,我看到了社会历史批评的创新性实践:澳大利亚卷第三章标题为“在多元文化社会关系中解构与建构澳大利亚”;新西兰卷第一章标题为“当代新西兰社会的多元化进程”;第四章标题为“立足当下:映射新西兰多元的社会现实”;太平洋岛国与地区卷上册的内容是,太平洋岛国与地区的社会历史文化和太平洋文学,下册第五章标题为“英语文学中的太平洋岛国与地区文化”,第六章为

“太平洋岛国与地区文化的文学表征”,体现出文史互证与融合。

八卷本遵循文本—社会—全球的横向路经,从“内部研究”走向“外部研究”,从文本走向社会历史的深处,既有“从内向外”,分析文本呈现的现实生活、社会结构、多元文化思想,捕捉文本中潜藏的时代心理;也有“以大观小”,从多元文化、文明多样性的宏观视角研究大洋洲文学代表作品。与此相对应,有大洋洲文学、多元文化主义、文明交流互鉴三个层级,构成文学—文化—文明的递进路径,体现了外国语研究与区域国别学研究的跨学科交叉融合。

国务院学位办2024年发布的《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简介及其学位基本要求(试行版)》界定了区域国别学的任务,即“打通原来分属于各独立学科的知识领域,系统探究区域、国别的历史与现状,揭示其规律和走向,形成交叉与综合的知识体系,为我国深刻了解世界提供学术指引”。区域国别学具有战略性、综合性、应用性特征,外国语研究与区域国别学研究可以互动互鉴,双向赋能,拓展各自的学科疆界,丰富各自的学科内涵。

在文学文本层面,文学作品中呈现的生活是具体的、活生生的个体体验,而这也是文学存在的形态:文学是从个体生命的角度出发,讲述对生活的具体感受和体验,这是感性的、经验的日常生活世界。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均从单一的角度对生活进行定义、分类,将其抽象化、理性化和概念化处理,无法把握生活的全部范畴,有其局限性,而文学作品中呈现的生活则蕴含“无尽藏”的丰富性,向读者提供各种解读、阐释可能。文学社会历史批评重视文本的建构性,从本体论出发,强调文学呈现表征了什么样的生活和怎样呈现表征生活。通过分析生

活经验如何被编码、被赋义,揭示出语言风格、人物形象、叙事结构、意象、修辞手段等审美形式背后的形成机制、思维模式、意识形态、文化认同、心理结构、民族性格等。外国语研究的成果可以转化为区域国别学研究的知识储备,助力人文交流与民心相通。

在社会文化层面,文学社会历史批评研究范式能够超越文本世界,走向真实世界,将作品深嵌于社会—历史语境之中,探究文学与周遭环境之间的交互、交叉、交融,特别是与主导的文化思想的复杂关系。大洋洲文学发展与多元文化这个社会—历史语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西方,多元文化主义首先作为社会思潮出现。1915年美国德裔犹太人、哲学家霍勒思·卡伦(Horace Kallen)提出了文化多元主义(cultural pluralism)这一社会学概念。在加拿大、澳大利亚,多元文化主义是政策实践。澳大利亚1973年实施以尊重差异和平等权利为目标的多元文化政策,20世纪80年代末期,多元文化主义成为澳大利亚一项基本国策。八卷本从多元文化视角研究大洋洲文学,分析多元文化主义的文学思想和创作实践。例如,澳大利亚卷第二章第一节从“文化身份”解读《凯利帮真史》,这一节由彭青龙教授撰写,他指出:“任何文学文本的解读必须放回到历史语境”。成果展示了大洋洲文学如何书写澳大利亚、新西兰从同质化社会、二元文化向多元社会、多元文化迈进的历史发展过程,这种文学社会历史批评的研究成果具有社会价值,可以融入区域国别学相关对象国的知识体系。

八卷本成果还有更高的立意,即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出发,从单个国家、地区社会文化层面拓展到全球文明交流互鉴层面。“理论卷”上册第一章讨论世界文明多样性与生物多

样性、文明多样性与世界科学技术中心转移、文明多样性与第四次科技革命、文化多样性与差异性以及文化多样性与交流互鉴,对“文明”一词进行新界定,即“文明是在宇宙中生物多样性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具有较高水平的社会文化,是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生态文化的总和,其中科技文明发挥着重要的形塑作用”。文明“本质上是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为基础,以人们的社会关系和生活状况为标志形成的”,提出“信息文明是第四次科技文明的现实反映”,文明有“科学技术性”。提升科技文明的分量,符合历史唯物主义,是中国学者对文明内涵的判断。文明多样性与差异性理论为区域国别学研究提供了学理支撑,“统合”了外国语研究与区域国别学两个知识体系,“为我国深刻了解世界提供学术指引”。

外国语研究可以为国别与区域研究作出独特贡献,而区域国别学研究也可以推动外国语研究这一传统学科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国别区域学具有鲜明的现实导向、问题意识和实践品格,旨在服务国家重大需求和战略使命,可以对文学研究的发展方向、重点确定起到导向作用,将文学的“无用之用”转化为“经世致用”,发挥哲学社会科学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资政育人、服务社会的功能作用,为之内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提交有价值的知识和答案。在具体研究方法上,促使外国语研究注意日常生活的现场与细节,尤其注重比较、考证,分析文本与史料的缠绕与转化,汲取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哲学等学科的理论思想,用实证的史料对外国语研究进行“锚定”,挖掘作家的创作动机、风格特色与社会—历史的深层关联。

区域国别学研究将文学置于全球文明发展的“长时段”历史脉络中考察,探究区域、国别的历史与现状,揭示其规律和走向,预测未来的发

展趋势,并给出具体建议。这方面八卷本也形成特色。多元文化主义起源于西方,并在西方国家实践,有较为成功的,也有失败的。“理论卷”下册第八章分析了大洋洲多元文化发展的现实困境,指出欧洲中心论的文明话语和欧美一元论的文化话语所彰显的是“二元对立和种族优越论的西方眼光”,“有可能忽略了文化自身交流融合的和谐性的内在需求”。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胸怀人类的世界眼光”,体现了包容性思想,八卷本作为区域国别学研究成果,就大洋洲如何超越文明与文化差异进行思考,阐述了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和“发展趋势”,即借鉴东方文化传统,特别是注意到中国文化传统思想的可借鉴作用,这些思想包括:承认差异,支持多样;彼此平等,互相尊重;和谐互补,共同发展;持中守正,避免偏激,体现“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以及“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中国智慧思维。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八卷本具有很强的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自觉意识,在对多元文化主义理论的整体理解的基础上,“独辟蹊径,从中国学者的视野和角度,以中国的文化思维为基础”,“提供中国学者主导的跨国研究的视角、中国的立场,建构一种渗透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的多元文化思想理论话语体系”。书中提到“中国视野”“中国视角”“中国立场”等,均体现出中国学者的主体性意识。

由此可以看出,八卷本是构建中国特色外国语研究与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成果,也是中国特色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成果,为外国语研究与区域国别学研究的跨学科交叉融合发展进行探索,树立起一个标杆,给我们很多启示和启发。

最近一段时间,学界持续讨论区域国别学这一新增交叉学科的建设与发展问题,在这一背景下,彭青龙教授的《多元文化视野下的大洋洲文学研究》八卷本丛书的出版可谓正当其时,为我们研究区域国别学提供了范例。今天,我就围绕区域国别学的学术理路、关键所在与现实价值谈点个人的看法。首先,我讲一讲学术理路的问题。从这套书的出版,包括彭青龙教授的研究实践可以看出,他走了一条学理研究的路子,这个对我们今天的区域国别学建设具有重要的启迪价值。彭青龙教授的研究是以“点”为基础的,他开始的时候研究的是澳大利亚文学。当其他很多人开始关注澳大利亚文学的时候,他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成就。如果说澳大利亚文学研究有两个代表性学者的话,一个是黄源深教授,另一个就是彭青龙教授。但是,彭青龙教授最大的特点是,他从“点”逐步深入,并开始走向“面”,通过澳大利亚这个“点”结合了大洋洲、东—西—方,以及内部和外部的多种矛盾,自然而然地从国别研究开始走向区域研究。他的第二个阶段是区域研究,也是他从《百年澳大利亚文学批评史》等“点”的研究中延伸出来的成果。下一步转到的第三个理路就是跨学科的研究,包括数字人文。整体来看,他的区域国别是以“点”走向“面”,走向今天最需要的跨学科。这个经验是我们今后在区域国别学建设中要坚持的东西,没有“点”“面”支撑的体系都是空心的。现在很多区域国别研究都是空的,“点”都说不清楚就说“面”,紧接着就“跨学科”,这正是我的担忧。而彭青龙教授用自己的研究实践展示了学术理路的发展进程,跟这套书中所倡导的关于多元文化主义的跨学科研究有了异曲同工之妙。

第二,区域国别研究的关键所在是什么?我认为外语学科主要是在语言文学原有的

基础上研究民族文化、民族思维和民族性格。外语学科开展的区域国别研究不可能做国际关系研究。国际关系有自己的学科体系,现在很多人也在从事国际关系的研究工作,但国际关系研究不是区域国别学的全部。简单来说,外语学科的区域国别研究与从事国际关系的区域国别研究关系密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为国际关系研究奠定文化基础,去研究一个民族性格以及这个区域的思维方式,理解文化和认知上的冲突,这是很重要的。这套书体现了这个非常鲜明的特点,我认为这个研究方向的关键点抓得很好。外语学科的区域国别研究应该重点培养学生向这个方向拓展,去研究民族思维、区域思维以及区域的文化沿袭传统。现在我们讲文明互鉴是带着善良和平的感情进行文明互鉴,但是从历史到现在,人类任何的文明互鉴进程都伴随着激烈的冲突。我们不了解它的冲突是实现不了互鉴的。

第三,这套丛书的现实价值很大。我不谈具体观点,就谈谈对我们学科面临挑战的启示价值。大家都说外语学科面临挑战,外语人才要转岗,但是往哪儿转?其实区域国别就是我们今后的路径。这既是老师们转岗的未来,又是外语学科的发展方向或者是增长点。彭青龙教授的这套书的出版,恰恰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范例,既有全局性的综合研究,也有区域研究,还有个案研究。通过阅读这套丛书,相信大家对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太平洋岛屿国家以及整个大洋洲都有更加全面的认知和理解,也能对从事区域国别研究有更加深刻的认识。



《多元文化视野下的大洋洲文学研究》成果发布会在上海交大举办。

体现中国立场和中国学者思想观点的《多元文化视野下的大洋洲文学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 陈建华

由彭青龙教授担任总主编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优秀成果《多元文化视野下的大洋洲文学研究》功底扎实、特色鲜明,本身质量很高,同时在方法论、学术体系等方面也有亮点,最为核心的是用中国的视角看问题,站在中国的立场上研究外国文学,这是成果最出色的地方。作者深刻阐释多元文化关系的复杂性,为构建以文明互鉴、文化共生为视角的多元文化思想话语体系作出了重要贡献。

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增多,学界越来

越重视学术研究的“中国视角”问题。“中国视角”不是一个新问题,晚清“西学东渐”之风初起时,一本介绍西方科学文化的综合性刊物问世,该刊物在序言中就强调“他山之助”,提到对外来文明成果要用中国人的目光,“博见广识”。20世纪初中期,国人在社科领域致力于介绍与引进,学习与追随。以俄国文学史的编撰为例。20世纪30年代开始大量引进欧美和日本学者的著作,50年代以后又翻译了不少苏联学者编写的文学史,其中某些还只是中学教材,但是它们

对中国学界产生的很大的影响,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左右了中国的学术话语,中国学者几乎失语了。可见当年的“跟随”程度之深。改革开放后才有了大变化,中国学者开始独立编写俄国文学史,去年北京推出的多卷本俄罗斯文学史,中国学者的视角就很清晰。最近几十年,从俄罗斯文学研究到整个外国文学研究,引进了许多西方的理论成果,西方的研究路径影响也不小。如果能站在中国的立场上“择善而从”,“他山之石”为我所用,这是好事,但有些研究成果受西方影响痕迹明显,

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成果的核心思路还是来自西方。

新世纪以来,中央提出要有自主意识、中国立场,这的确非常重要。现在我们国家逐步强大起来,自然科学领域要讲自主,人文学科同样需要构建自己的学术体系,而我们学界也是在这个方向上深耕了很久。所以在这点上,彭青龙教授的研究非常有意义:立足于中国学术土壤研究外国问题,在探讨多元文明时,能从中华多元文明的精髓中汲取思想养分,这是非常好的。

关涉于“世界文学”的“区域国别研究” ——《多元文化视野下的大洋洲文学研究》

北京大学 张冰

《多元文化视野下的大洋洲文学研究》成果出版,既是一项我国世界文学研究领域具有重要引领意义的重大成果,也是中国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中一项成功的实践范例。如果说中国的外国语言文学研究,包括系统的外国语言文学人才培养是随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而来,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产物,那么当下中国的世界文学研究则可以说是与全球化进程中的跨文化、跨学科研究密切相关,是构建中国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甚至就涉及多个学科,涵盖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的人类社会的文明史研究而言,如何理解和界定“世界文学”,已成为构建新的世界秩序和文明格局的重要观念视野。因此,歌德的“为19世纪日新月异的社会敞开了跨国思维的大门”的“世界文学”在达姆罗什(David Damrosch)看来,便是“融汇了一种文学视角和一种崭新的文化意识,令人初识正在兴起中的全球现代性的‘词汇’”。在方维规看来,则“是一种源自文学生产者之间的互动,促进世界范围的社会共同作用的理想”。因此,关涉于“世界文学”的“区域国别研究”与其说是研究各个国家区域的文学事实在或者国情,不如说是反映区域国别文学文化系统的发展演变及其影响关系,探寻其文明发展模式,本质上是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交叉的多学科研究。正如俄罗斯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自20世纪60年代开

始,编撰的9卷本《世界文学史》中,就“特别注意文化地区,如西欧文化区,阿拉伯—伊斯兰教文化区,印度文化区,远东即中国文学(汉字)区等,每个文化区都有自己地区的古代文化,如西欧文化区——古代希腊经及罗马文学,中国文学区——中国文学。显示文化区文学发展规律之外也注意到文化区之内的文学关系及各文化区之间的文学关系及其特征。”2001年,莫斯科大学教授维·费·沙波瓦洛夫(B.Ф. Шаповалов)在其著作《俄罗斯学》中对“俄罗斯学”的定义则是,“俄罗斯学是基于世界文明研究传统,将俄罗斯文明作为鲜活的多民族统一体进行的综合性、跨学科研究”。

在此意义上,《多元文化视野下的大洋洲文

学研究》成果立足于世界文明多样性、多元文化主义和20世纪70年代以来包括澳大利亚文学、新西兰文学和太平洋岛国与地区文学的大洋洲区域代表性文学作品等内容,从理论思想、批评实践、文本个案解读等多维度对其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既整体考察大洋洲区域文学思想的多样性与文化复杂性,亦针对性地聚焦多元文化主义理论,阐释其在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太平洋岛国与地区的实践特征与演变逻辑,提出“澳大利亚由‘三A’文化帝国向‘五A’文化共同体转变”等原创性观点,从而对“文明”这一核心概念进行重构,提出新的内涵与阐释路径,为理解世界文明格局的重构提供了新的理论资源,体现出中国学者在区域国别学自主学术话语体系构建中的学术张力和自觉的责任担当。